

“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中的运用

——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为分析对象

樊慧慧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武汉，430074

邮箱：820745143@qq.com

摘 要：“唯物史观”作为郭沫若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指导思想，其形成过程与其时代背景及个人经历息息相关。此书不仅是其“唯物史观”方面的代表作，其对罗振玉、王国维所从事的甲骨文研究进行的褒贬，可见其甲骨文成就造诣非凡。通过对《周易》《诗》《书》及出土文献，如卜辞、甲骨文的研究，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创建起一个中国古代的文化体系。

关键词：“唯物史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古代文化体系

收稿日期：2019-05-05；录用日期：2019-07-12；发表日期：2019-08-02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by Guo Moruo is Taken as the Object of Analysis

Fan Huihui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Abstract: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Guo moruo's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This book is not only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h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the praise and criticism of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f Luo zhenyu and Wang guowei. Through the study of *zhouyi*, *shi*, *shu* and unearthed documents, such as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inscriptions on bones, a cultural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was cre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uo moruo;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Ancient cultural system

Received: 2019-05-05; Accepted: 2019-07-12; Published: 2019-08-02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郭沫若与“唯物史观”

郭沫若（1892—1978），男，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出生于四川省，早年曾留学日本，并且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他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现代文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器研究专家，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并称为“甲骨四堂”。其在“甲骨文”方面的造诣可见一般。学界有关“甲骨四堂”方面的研究论文，如谢济的《“甲骨四堂”的比较研究》^[1]、何思玉的《“甲骨四堂”及其他》^[2]、宋治洲的《“甲骨四堂”都是谁》^[3]及冯雷、余和祥的《郭沫若何以跻身“甲骨四堂”》^[4]，并且在冯、余的文章中，两位学者从“以前人研究为基础”“把握治学规律与方法”“甲骨学才实卓越”“甲骨学成就斐然”四个角度阐述郭沫若在“甲骨学”方面的成就，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便是“甲骨文”。

此外，他还是我国史学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在这一方面，郭沫若无疑具有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先河的功劳。“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可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一般性规律的理论。郭沫若在进行史学研究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时，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思想，通过对现存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文献资料的考察，并参考罗振玉、王国维及顾颉刚的“古史辨”等已有成果，进行褒贬论述。

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各种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中的一种，也随之传入了中国。其在中国的传播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27 年；第二阶段是 1927—1937 年；第三阶段是 1937—1945 年；第四阶段是 1946—1949 年。以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阶段。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初版发行于 1930 年。其新版，即 2011 年由商务印刷馆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仍旧可见郭沫若写于 1929 年 9 月 20 日的自序。从其自序当中可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与近代民族危机、各种救国思潮及各种西方史学思想传入中国有关。此为其写作此书的第一点。对于郭沫若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学者认为是其为“中国社会史论战”而写，有学者

认为其在写作本书的某些篇章时，其论战尚未开展。笔者在此只点出学术界分歧所在，而不详加分析和探讨。至于其是否相关，笔者以为，郭沫若处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若言其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与当时出现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丝毫不关，当不可信。尽管郭沫若在写作此书时，论战尚未开始，但史学家所具有的史学前瞻性，也当有助于洞悉社会发展状况。故此，郭沫若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爆发无直接关系，亦不可说丝毫不关。

此外，对于“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价值，在其自序中写道：“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成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5]此处，郭沫若所指恩格斯著作当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此书是“对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和阐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6]。而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均为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的代表，受清代文化政策的影响，在史学方面的成就更多的表现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辨伪等方面，更多的仍旧是偏重于实证主义的阐述。尽管自唐刘知几《史通》之后，史评类著作大量出现，摒弃以往正史之后以“太史公曰”“赞曰”等形式出现的史评，而以专著的形式出现，清代章学成的《文史通义》可谓继刘知几《史通》之后的又一部史评、史论方面的著作。但综观中国传统史学，无论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抑或是清代乾嘉考据学派，对理论层面尤其是宏观理论层面的建设尚有待缺乏，更多的仍旧是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史评史论类著名较前之二中较少，宏观理论方面，尤其是较为成熟的且能够指导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还尚且产生。故此，在此之即，郭沫若首借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体现的宏观指导思想，视作中国史学发展及中国前进道路的“启明星”。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通过“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重塑”史学界对上古史的认识体系。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自己亲身践行，将这种研究方法与自己长期以来所从事的甲骨文研究结合起来，力求通过大量的文本资料，尤其是出土文献及其钟鼎文献、卜辞等，

完成其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希望借此起到警醒国人的作用。此为其写作此书的第二点。关于写作本书的第三点，郭沫若在书中写道：“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5] 故此可知，写作本书的第三条缘由，即为弥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中国研究的缺失与遗忘。综上，笔者认为郭沫若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于以上三个缘由：一是受时代大背景的影响，抑或者其自身经历的影响；二为中国学术界注入新鲜血液的殷切希望；三为弥补世界遗忘中国的遗憾。

2 “唯物史观”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2011 年再版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第二部分为第一至四篇。具体为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第四篇：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第三部分为附录，即追论及补遗。也是区别于旧版之所在。谢保成在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读中认为此书“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建立起‘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的现代史学名著”^[5]。全篇文章他从五个部分来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进行导读与分析。分别是：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认识中国的最新观念；考察古代社会的最新成果；创建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主要版本与重要修订。笔者认为，通过对其导读的分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本书的理解及“唯物史观”在我国史学当中的运用。

导读的第一部分即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重点分析了当时的时代趋势，如各种新思潮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受其影响，纷纷选取其中一样，作为阐述其自身学问的依据；伴随着观念的兴起，大量的出土文献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尤其是大量的甲骨文被挖掘，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甲骨文研究逐渐兴盛起来，丰富了对传统古代社会的认识。导读的第二部分即认识中国历史的最新观念，其重点分析了郭沫若写作此书的缘由及其独具慧眼的史学眼

光,并且就郭沫若写作此书是否是以为政治服务,是否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出现有关,谢保成在此处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有理有据。他认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产物。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如前所述,史学家所具有的史学前瞻性,本身便有助于其洞悉社会发展状况的本能,从这一点上而言,史学家往往能够看到同时代人看不到的“未来”,而作出往往不被他人所理解的行为与举动。

导读的第三部分考察古代社会的最新成果,着重论述了郭沫若在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时最大限度地综合了当时学术文化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几家最新研究成果,并且分别对其进行了褒贬。主要表现为与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不期而同”与以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为出发点的研究。其在书中多处对罗振玉与王国维对甲骨文的考证进行批判和补充。如郭沫若在书中第三篇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中认为“罗辑卜辞一千一百六十九条,……除五百三十八条的祭祀占最大多数外,一百九十七条的渔猎占次多数。……但这样的书目很容易使人发生一个错误的判断:便是商代的社会是一个渔猎时代的宗教迷信的社会。……所以他所考释出的成就不能作为统计上的根据,不过在便宜上就根据他所考释出的成绩也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5]。可见,郭沫若对罗氏在甲骨文方面的成就有其自己独到的见解。导读的第四部分即创建起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着重论述了其在这方面的成就与突破,并且认为“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能够如此集思想、学术之大成,从观念、学术两个方面领导思想文化潮流者,无论如何都绕不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5]。谢保成认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创建起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突破”、一个“建立”上。在其所论述的三个“突破”与一个“建立”上,高度强调甲骨文于史学研究的价值所在,除传统的王国维与陈寅恪所先后阐述的“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到如今的“多重证据法”外,地下之出土文献,仍旧是资料来源及其考证纸质文献资料真伪性最主要的来源之一。无疑,对于上古史研究资料的严重缺乏,有效而准确的运用甲骨文资料,显的便十分重要而弥足珍贵。郭沫若在罗振玉与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去伪存真,建立起一个“全新

的国故体系——跳出‘国学’的范围，认清国学的真相。[5]”此外，同样作为“甲骨四堂”的董作宾，亦是甲骨文研究方面的大家。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一文中写道：“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廿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郭书所用的旧史料与新史料，材料都是极可信任的。他所研究的结果，当然可以得到多数人的赞许。”[7]这样，不仅肯定了郭沫若在唯物史观派中的地位，而且对于其在上古史与甲骨文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用甲骨文所“建构”起来的上古文化体系表示了肯定与认同。导读的第五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即主要版本与重要修订，着重为我们介绍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 1930 年 3 月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第 1 版后，多年来的内容修订情况及出版状况。体现了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故此，笔者认为，通过对谢保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郭沫若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过程有所了解，尤其是通过对其第四部分即创建起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的分析，并结合原书，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原书的内容及郭沫若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学中，对上古社会状况及其文化体系的分析，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

3 结语

郭沫若作为我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进行上古史研究的学者，其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仅表明其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古代社会方面的成就，其在书中对于传统的传世文献的掌握与运用，如《周易》《诗》《书》等文献，亦可窥见其非凡的史学洞察力，尤其是其对于出土文献，如卜辞，甲骨文等文献的掌握与分析，更能体现其在甲骨文方面的成就，其对罗振玉、王国维在甲骨文方面的成就所进行的褒贬，简明扼要，发人深省。甲骨文成就可见一般。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并称为“甲骨四堂”。其在书中的第二部分即第一章《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

之反映; 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 第四篇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等均是运用“唯物史观”, 抑或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 通过将纸上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 论述上古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及历史发展阶段, 并且通过对文献的分析, 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井田制并不存在, 只是一种虚构出的理想社会模式, 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 [1] 谢济. “甲骨四堂”的比较研究 [M] // 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455-468.
- [2] 何思玉. “甲骨四堂”及其他 [J]. 寻根, 2008 (4): 60-62.
- [3] 宋治洲. “甲骨四堂”都是谁 [J]. 咬文嚼字, 2012 (7): 47.
- [4] 冯雷, 余和祥. 郭沫若何以跻身“甲骨四堂” [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 (5): 14-19.
- [5] 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11.
- [6] 白燕妮.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导读及当代价值 [J]. 求知, 2018 (7): 55-57.
- [7] 董作宾. 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 [J] // 刘梦溪主编.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614.